

# 论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

刘丁豪

(西华师范大学,四川南充 637000)

**【摘要】**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开始觉醒。他们紧跟时代步伐,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而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分化与转型。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转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封建知识分子向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从近代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从向往资产阶级民主的知识分子向信奉马克思主义说学的知识分子转型。

**【关键词】**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转型

**【中图分类号】**D6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4-0090-03

面对民族危亡,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不断觉醒。他们紧扣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步伐,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而开始并完成了自身的文化和政治分化与转型。

## 一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分化与转型——从封建读书人到近代文化人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转型发生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一部分接触和接受新式教育思想和文化知识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封建读书人人群中分化出来,转型为掌握新知识和具有西方文化思想意识的近代文化人。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分化与转型是从民族觉醒开始的。鸦片战争后,四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保持着比较封闭的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本上未予触动;闭塞的四川知识界对民族危亡的感受并不深刻,当时的四川知识分子们依然睡眼朦胧,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仍然麻木不仁、愚昧无知。但是,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特别是在清廷甲午惨败之后,四川知识分子“莫不激昂愤慨”<sup>[1]</sup>，“认识到入学中举的思想,是腐败落后的,它对于救国救民只有害处,毫无益处,知识分子应当吸取文明进步思想,以研求救国救民之道”<sup>[2]</sup>。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政治的沉睡中惊醒过来,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脱离封建士大夫的轨迹,转而思考和探求中国的局势与国家出路问题。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吴玉章曾这样说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更加激发了我的爱国热忱,我需要寻找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但是,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我有些茫然,正当我在政治上十分苦闷的时候,传来了康梁变法维新的思想,我于是热烈地接受了它”,“我们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维新的志士,对于

习八股,考功名便没有多大的兴趣了”。<sup>[3]</sup>

四川旧知识界的变化,以民族危亡为契机,以尊经书院的建立为起点。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尊经书院不仅在办学理念、教学内容上有所创新,而且在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上也有显著改变。四川近代知识分子中不少著名人物如宋育仁、廖平、吴之英、骆成襄、徐炯、顾印愚、吴玉章、黄芝、蒲殿俊等人都曾在此工作和学习,另外还有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与尊经书院有着联系。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还是在封建传统教育体制下接受教育,但他们中的许多人的学习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悄然发生着转变;他们开始关心时事、政治,留心西学、新学,关注国计、民生;他们把自己的学习和改造国家联系起来;他们中的一些先进代表也开始逐步形成了于近代中国和近代四川有着重要影响的新意识和新思想,成为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先驱。可以说,尊经书院的建立,不仅打破了四川旧知识界的沉寂,而且也开启了近代四川知识分子文化转型的序幕。

如果说18世纪70年代尊经书院的建立和90年代四川新式教育的出现,只是促成了近代四川部分知识分子从传统士子的队列中分化出来成为四川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的话,那么20世纪初,清廷“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则成为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全面文化转型的标志。学术界普遍认为,四川近代新式教育之始是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当年,川东兵备道在重庆巴县设立四川第一所洋务学堂,这成为四川近代新式教育的发端。随后,一些以民办、官民合办为主的新式学堂开始在四川各地建立,如成都的中西学堂、遂宁的经济学堂等等。但是,这些学校只是在传统封建教育的汪洋中慢慢生长起来

收稿日期:2008-09-04

\*基金项目:本文为四川省思想家研究中心资助课题。

作者简介:刘丁豪(1966—),男,副教授,西华师大商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史学研究。

的近代教育,与奉行传统教育体制的旧式学校相比,所占比例极低,影响也较有限。直到1901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兴办新学之后,情况才开始发生明显转变。1902年,四川设立川省学务处,以“督办全川学堂事宜”。于是,四川旧式学校被正式废止,近代学堂在全川开始普遍建立起来。到1910年时,全川新式学堂达到11387所,学生达到441738人,在全国名列前茅<sup>[4]</sup>。官方新式教育的兴办,正式吹响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文化转型的号角。正是因为依赖政府行为搭建起了这种更具权威性的教育平台,改变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教育土壤,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方才完成了第一次转型。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转型是以文化转型为特征的。

首先,在知识结构和文化内涵方面,随着留学运动的兴起和新式教育的开展,四川近代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封建教育的羁绊,开始接受西学的教育与洗礼,用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知识、新思维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完成了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文化内涵的更新。

其次,四川近代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更新的同时也逐渐完成了自身的文化角色转化。他们开始从弘扬儒家经典、维护封建礼教、谋求功名利禄的封建士子的文化角色转化为宣传科学技术、反对封建迷信的近代知识分子。虽然,在他们身上,中西文化交融的二元性仍或清晰可见,但是,就其承担的文化责任和文化使命看,他们已经不同于传统封建士大夫和封建文化传道者了,他们不再以“为帝者师、王者傅”作为自己的最高文化责任和政治理想,也不再以封建主义的那种“学而优则仕”作为唯一的人生价值标准,而是以倡兴科学、学以致用、利用所学知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作为个体和群体共有的文化使命和价值取向。

其三,在这场近代中国社会史无前例的政治变革、文化转型的浪潮中,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分化与转型并不明显。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上,虽然当时的四川知识分子已经表现出了较强的爱国热忱和关心时事、忧国虑民的政治激情,但从本质上说,他们仍然属于安分守己,甘愿听从封建主义召唤,希冀维护封建皇权的读书人。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民族意识和民权意识的觉醒上,而于政治立场来说,并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变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只是觉得外国人的可恶可恨,而于清政府还不敢敌视仇

视。”<sup>[5]</sup>与传统封建知识分子相比较,其政治立场还是基本一致的,与封建主义还没有进行政治决裂。所以,当时的四川知识分子群体转型主要以文化转型为主,政治转型为辅。

## 二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二次分化与转型——从维新改良者到革命救国者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二次转型开始于20世纪初,至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时期达到高潮。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的过程,是一个新知识分子群体与旧知识分子群体决裂的过程。20世纪初,随着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四川近代知识分子有了新的政治觉悟。面对清政府一次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和一次次以改革为幌子对广大人民进行的欺骗,一部分知识分子逐步认清了封建主义的真实嘴脸,开始了新的思想转变,开始抛弃改良主义的幻想而祭起了革命救国的大旗。在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中,有几次重要事件极大地影响着他们政治思想的转变和政治立场的分化。第一次是维新变法,第二次是预备立宪,第三次是四川保路运动。三次事件的结果,都极大地伤害了四川知识分子的情感,致使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清朝政府从希望到失望、从失望到绝望,最终不得不放弃政治改良而代之以革命救国。正如辛亥革命志士、同盟会会员、巴县人向楚所说,当时,知识分子们“深感清王朝政治腐败,丧权辱国”,“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非革命难以达到自己的意愿和要求,因而赞成‘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斗争纲领,下决心投入革命斗争的洪流”。<sup>[6]</sup>因此,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们如吴玉章、喻培伦、龙剑鸣、杨庶堪等,以《革命军》为号角,以邹容为先驱,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向着革命救国的道路而奋勇狂奔。而另一批与封建主义势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知识分子如宋育仁、蒲殿俊、罗纶、潇湘、邓孝可等,则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抱着维新改良的思想不放而反对民主革命。于是,以政治立场为分界,四川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分化为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集群和主张改良立宪的知识分子集群。

## 三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三次分化与转型——从西式民主主义的向往者到马克思主义的追寻者

近代四川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三次分化与转型开始于五四运动前。这次转型与第二次转型一样,以政治思想分化与转型为主要特征。

四川知识分子群体之所以再次出现了分化与

转型,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全国范围来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屡屡失败,中国民主革命者希望通过资产阶级式的民主革命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梦想在屡次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后已魂断南桥;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鼓吹者们希望在中国建立西式社会文明的美好愿望也在资本主义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迅速破灭。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已从世界大战的残酷性、破坏性中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祸害,开始担忧中国仿效西方样式建立资本主义国家的负面后果,因而开始追寻一个更加合理、更加美好的方案来改造中国。这成为促使包括四川知识分子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新的思想分化和转变的根本原因。

其次,留法、留俄潮的兴起推动了四川知识分子的政治转型。1912年夏,吴玉章、黄复生等组织成立了“四川俭学会”,在成都少城济川公学设立留法预备学校,发动四川青年分子赴法留学,从而掀起了四川学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十月革命爆发后,留俄运动又迅速兴起。到1918年,四川留法、留俄运动达到高潮。四川部分知识分子到法国、俄国勤工俭学的这段生活和工作经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想法,也改变了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行为。因为,一方面,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以及资本主义

社会的黑暗,也感受到了无产阶级生活的苦难和悲凉(不像在中国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受到的主要是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容易将社会罪恶的根源指向封建主义,希望用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接触和学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资本主义的思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改良主义的思想,等等”<sup>[6]</sup>,特别是到俄国留学的知识分子近距离地接触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所以,在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中容易产生对资本主义的不满,也容易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从而为他们放弃资本主义革命而转向社会革命奠定了基础。

再次,十月革命的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加速了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分化和转型。正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吴玉章在回忆五四前后的思想转变时也说:“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sup>[7]</sup>。可以说,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对四川知识分子群体是一次深刻洗礼。自此而后,越来越多的四川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中分化出来而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阵营。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陈法驾.华阳县志(卷16,人物10)[M].成都:巴蜀书社,1992:8.
- [2]向楚.蜀军政府成立前后[A].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 [3]吴玉章.辛亥革命[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60:32.
- [4]隗瀛涛.四川近代史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96.
- [5]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M].北京:中华书局,1965:41.
- [6]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A].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5.
- [7]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A].五四运动回忆录[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79:61.

##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ichuan Modern Intellectuals

LIU Ding-hao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Sichuan modern intellectual groups were to be awakening under the stimulation of the national crisis. They kept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and began to differentiate and transform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rn society.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ichuan modern intellectu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namely from feudal intellectuals to modern new type intellectuals, from modern intellectuals to capitalist revolution intellectuals and from capitalist revolution intellectuals to the intellectuals who believe in the Marxist scientific socialism.

**Key words:** Sichuan; Modern Intellectuals; Transformation